

革命火种在兴县播洒

晋绥首府印象记(二)

□ 牛寨中

在兴县出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刘亚雄。她是晋西北开明士绅刘少白的长女，1901年10月生，自幼就显示出与其他女孩子的不一般，7岁时女子本该缠足，她却带头实现“男人去发，女子放足”的民权主义，是兴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

1923年，刘亚雄考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受到了李大钊、许寿裳、鲁迅等人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利用学校放假返乡机会，在进步青年中积极宣传“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和进步思想，通过介绍阅读进步书刊，提倡新文化运动，在兴县部分青年中开始传播着民主革命的新思想，逐渐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为共产党在兴县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932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陕北迅速展开。陕北有了共产党，并建立了游击队，这对兴县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极大鼓舞。兴县和陕北佳芦(今佳县)、神府县隔河相望，山水相依，习俗相近，人文相同，两岸群众历来有着通商通婚的密切关系。为了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北特委将兴县沿黄河一带作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秘密派人从黑峪口、桑湾、罗峪口等渡口，乘木船、骑洪筒，将共产党的理念和主张，送到了兴县黄河岸边。当时，神府地下党组织设在贺家川，不久又迁往温家川，两地都和罗峪口一河之隔，往来十分便捷。第一批从神府县过河来兴县的地下共产党员有贺开山、刘法宽、高步功、弓占魁等人。

贺开山，原名贺汉政，乳名贺区旺，神木县彩林人，与兴县桑湾村仅一河之隔。他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经神木县委负责人乔钟灵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担任佳芦第十区区委书记。1934年正月，受中共神府县委的派遣，到兴县沿黄河一带开展党的工作。他利用走亲戚的机会化装成小货郎，来到赵家坪宣传革命道理，并参加赵家坪道情戏班，利用走村串乡演出之机，发展贫苦农民赵贵旺、王怀生、赵怀金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家坪村的王玉枝以贩麻生

意渡河，在神木县高家塔村经共产党员高区旺介绍入党，返回赵家坪后，又介绍赵补树、赵果清、赵黑小入党，并由王玉枝担任支部书记。

刘法宽，原名刘扣扣，1931年入党，1933年冬受神木一区区委派遣，协助贺开山到赵家坪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到兴县后，他住在赵家坪北山五里地的白家茆，以帮助姐姐照料家务为名，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在白家茆、泥衣山几个山村，先后介绍白锦相、白买地、刘善地、刘善忠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阎锡山进行剿共，大搞白色恐怖，刘法宽在群众的掩护下撤离兴县，返回陕北参加了游击队。

高步功，神木县高家圪塂人，1931年入党，中共神木一区区委书记，1933年春受党组织委派，到兴县开辟党的工作，他在黄河东岸山梁上的阎家塔村小学当教师时，以讲故事的形式，给群众讲解革命道理，先后介绍刘巨前、白怀茂、白崇山等人加入党的组织。

贺果生，神木县贺家川人，1929年陕北干旱无雨，颗粒无收，贺果生带着一家老小，逃荒到黑茶山脚下的碾馃村生活，1933年秋，他得知陕北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偕同两个弟弟贺来生、贺贵生一起以返乡探亲之名，回神木寻找党组织。不久，由共产党员王振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陕北特派员派遣，返回黑茶山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在碾馃、卧羊、田家会、井子、阎老湾，发展冯进魁、王引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

贺家会、卧羊、田家会、碾馃等乡村住着的贫苦农民，大部分是从陕北沿河一带逃荒过来的。他们听说神木有了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纷纷返回原籍。贺家会的贺双元、贺万盛、贾怀功回原籍后先后加入党组织，又按照党的指示重返贺家会一带开展党的工作。1934年冬，由贺双元介绍，贺家会的王德金、贺五元、高补怀、乔殿珍等人加入党组织，成立了党支部。

1934年秋，晋陕峡谷的桑湾村，走出了个既贫苦又不安分的青年白崇山，他在界河口旅店当伙夫时，接触了陕北赴山西采购物资的地下党员，逐步了解了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开始向往革命，他凭借良好的水性，偷偷将红军急需用的物资塞进羊皮洪筒内，跳进黄河，泅水运至对岸。神木第五区委书记高步功慧眼识才，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在高的帮助下，又在桑湾村发展白崇真、白玉山等人入党，成立了中共桑湾党支部。

从1932年到1936年4月，兴县先后在赵家坪、碾馃、次己山、桑湾、卧羊等地建立党支部15个，发展党员近百名。红色的革命火种，在兴县大地上四处播洒，已有燎原之势。



黄河两岸运武器

——晋绥首府印象记(三)

□ 牛寨中

“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呼啸如虎狼……”这首形象自然的战斗歌曲，鼓舞着无数革命志士为了正义事业不怕牺牲，舍生取义。

从1932年到1936年，短短几年间，兴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中共神府县委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地下党组织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巩固发展党组织，为陕北红军输送兵源；二是为红军提供武器装备；三是掩护潜伏在兴县的地下党员开展革命工作。这几项工作中，为红军提供武器装备，采购枪支弹药是党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1927年8月7日湖北汉口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当时国情，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这个特点在黄河沿岸具有同样的适用性。

1932年以后，神木南部开始建立神府革命根据地，1936年，建立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1937年，苏维埃政府改为神府县政府，直隶于陕甘宁边区。版图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约14万，包括23个行政区，其中兴县有三个秘密区：即赵家坪区，区委负责人为贺开山；紫金山区，区委负责人贺七十；康宁镇区，区委负责人贺万胜。1934年8月起，驻守榆林地区的国民党开始了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并岳秀的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民部围剿神府根据地，年底又开始了第二次围剿。敌八十六师3个团进攻神府区。这次战斗，神府根据地损失很大，红军游击队511人，只剩100多人，党员3800余人只剩下400多，根据地缩小了百分之八十。在陕北红军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陕北党组织指示兴县地下党员，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帮助陕北红军采购枪支弹药、转运物资、扩充兵员，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和壮大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神木根据地党组织派遣红军战士高时德、马志到太原采购枪支弹药，他俩从罗峪口沙窝渡河后，找到芦子坡和李家洼共产党员王佩正、马有嘉，一起去太原设法买到5支步枪、500发子弹、三把六轮子、两把八鞭子、100余发手枪子弹，还有一架望远镜，经过千辛万苦，将这批武器送给红军。

为了进一步扩充武器装备，神木县游击队政委王兆相亲自渡河，在黄河脑畔的

馃头村，找到进步青年、村闾长王治礼，与阎锡山驻桑湾村的河防营拉上关系，从一些官兵手里买到30颗手榴弹，500发子弹，又用自己的两石七斗小米买到27发手枪子弹。谁知走漏了消息，敌人搜捕红军来到馃头村，王兆相被围困，情急之下，王治礼将王兆相捆在院内的一捆谷子干草中，背到村外的一孔破土窑洞里，使王兆相躲过一劫，带着枪支弹药安全返回陕北。为了报答王治礼的救命之恩，建国后，开国少将、工程兵学院政委王兆相曾专程看望王治礼。

1935年7月19日，高时德、马志在罗峪口地下党员王佩正、马有嘉等4人掩护下去太原购买枪支弹药，住在小南山中共地下交通员乔殿真在半山崖挖掘的土窑内。结果被临县麻儿湾恶霸地主李庆绪之子李候楞发现，当夜报告给防共团，第二天黎明，二人被抓捕，押送太原阎锡山陆军监狱，抗战爆发后他俩才被保释出狱。

为了掩护兴县地下党组织为陕北红军采购军用物资，1935年4月，山西和陕北党组织开辟了一条罗峪口—赵家坪—贺家会—白文—段家湾—岚县—方山—交城—清徐—太原的地下交通线。阎锡山派员在这条交通线上安扎了十余处关卡，给采购物资的同志带来极大困难。尤其是段家湾关卡，由阎锡山兴县公安局防共保卫团把守得相当严密。这年夏季，神府县委指示碾馃村党支部配合红三团十一支队拔除这个警卡，要共产党员冯进魁打警卡做内应。冯通过本家侄女、阎长的儿媳冯盖盖了村长印章，作了一份假证明，顺利混进“清乡队”。之后，他又联络“清乡队”队长李光复，将他派到段家湾警卡工作。到卡后，他抓住警卡二头目杨十长的弱点，投其所好，取得出入自由，很快摸清了警卡兵员力量、活动规律及枪支弹药库房，然后将情况报告了党支部。

1935年7月20日晚，地下党员贺开山带领十一支队，按照摸卡计划到达碾馃村，与党支部共同研究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决定于26日晚行动。当晚，卡上只有6人，杨十长回来后倒头便睡。冯进魁轮班接班后，其余人回屋休息，凌晨两点，他见5个人都睡得进入梦乡，就将警卡人员的衣服、枪支偷偷放到门外，又将电话线割断，然后发出信号，附近埋伏的十一支队战士立即行动，冲入宿舍，收缴了警卡上的枪支弹药和军装，然后转移到木沟山林中隐蔽起来，27日晚，十一支队和地下党员冲出清乡队的包围，转移到阎老湾村，几天后回师陕北，冯进魁也参加了红军，随十一支队到达陕北，先后参加了陕北三次反围剿战斗。

红色吕梁

